

历史上的东渐和西传

王维江

早年的西传,中国人、阿拉伯人是知识和产品的输出者,西方人是得益者;近世的东渐,中国人成了得益者,阿拉伯人似乎是受害者,西方人呢? 本文系作者穿插个人经历,为“中国知识和产品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学术讨论会所作综述。

2016 年 12 月 10—11 日,“中国知识和产品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举行。来自中、德、日的 20 余位教授、记者、策展人和自由撰稿人探讨了中国茶叶、中医、中药、园林、花卉、瓷器、屏风、白铜、皮影以及造船技术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2016 年 12 月 19 日晚,柏林,一辆重型卡车冲入具有地标象征意义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附近的圣诞市场,造成 12 人死亡、50 余人受伤。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恐怖袭击。

把这样两件毫不相关的事放在一起,原因有二:一是 21 日我飞往柏林,妻子说她携子在恐袭前一晚逛过该处,所所在位置在次日恐袭时遭车碾压——何其幸也!二是以往惯例圣诞节要出游,今次本想去土耳其托普卡普宫看瓷器,世界不太平,怎敢去“火药桶”?只好宅在家里,胡思乱想:眼前发生的一切,与本课题有关吗?似乎没有,但恐袭实际已涉及欧亚非三大洲的人,这世界早就成了地球村,福与祸紧密相连。无论是知识和产品的东渐还是西传,总是说明人与人之间心存善意,互惠互利;一旦心生怨恨、滥杀无辜,知识和产品的东渐和西传便失去了前提。早年的西传,中国人、阿拉伯人是知识和产品的输出者,西方人是得益者;近世的东渐,中国人成了得益者,阿拉伯人似乎是受害者,西方人呢?大家还是好好看一下历史上的东渐和西传吧。

12 月 23 日,突尼斯籍恐袭罪犯在米兰被意大利警察击毙,令人长舒一口气。24 日中午,我决定前往多得利中餐馆,欢度洋节。柏林最好的几家中餐馆都坐落在康德大街上。我想起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物质文化是思想文化的基础;又想起朱维铮先生一直不避讳西方汉学家馈赠给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桂冠,“衣食住行”正是马克思分析社会理论的起点。

多得利餐馆是一座老房

子。老板娘说,当年朱德就住在楼上,我们所坐的桌位,也是周恩来当年喜欢坐的地方。据说,当年不只是朱德、周恩来等革命家来中餐馆,读书种子陈寅恪、傅斯年也是这里的常客。有一次,席间因辩论政治问题而翻脸,大打出手,周恩来和陈寅恪无奈逃进老板娘的房间。

正胡思乱想,老板娘端上了桂花肉桂茶,芳香扑鼻,口味独特。老板娘说,外国人也好这一口。肉桂很早就是陆上丝绸之路的热门外销品,孰料遗风余韵至今未歇,而桂花树于 18 世纪后期传到英国。忽然觉得,不仅研究革命史,应关注中餐馆;研究中器西传,也该把中餐馆作为考察的路径。

茶是饮品,又是奢侈品,因而也是时尚品。最早把茶运到欧洲的是葡萄牙人,其次应是荷兰人。上海外国语大学荷兰问题研究中心的陈琰璟先生利用第一手的荷兰语文献,在《近代荷兰人饮茶习惯研究》一文中阐明,最早把茶叶运回阿姆斯特丹的是成立不久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培养消费者的饮茶习惯,17 世纪的荷兰商人在报纸上密集营销,鼓吹茶叶超乎寻常的“祛病强身、延年益寿”功效。这些话竟然让药学家、博物学家甚至医生也深信不疑,有人著书列举出茶叶的 25 种功效:“清血、去噩梦、醒脑、去头疼、消水肿、明目、增强记忆、通便、去肝火、祛风湿等。”痛风是食肉饮酒过多的西方人的常见病,茶叶被看作是可减轻疼痛的植物。当时荷兰的茶叶价格昂贵,富人竞购摆谱、妇女以茶会友,又引起道德家的疑虑和愤怒,报纸上不时出现讽喻劝诫的文章和插图。这种情形,与 1980 年代喇叭牛仔裤、蛤蟆镜在中国大陆流行所引起的效应又何其相似?

茶叶不仅在老欧洲流行,也是新大陆的抢手货。17 世纪中叶,荷兰人最先把中国茶叶带到北美的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这时的茶叶纯粹是饮品,饮茶习俗受到其殖民地母国英国的影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林立强教授的论文《传教士与福建茶叶向美国的传播——以晚

清入闽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为个案》揭示了新教传教士的另一面。虽说 17 世纪的在华耶稣会士也经商,但所获利润仍然用于传教。卢公明在华工作近 20 年之后脱离教会,受雇于美国琼记洋行,担任茶叶贸易的翻译工作,所著《英华萃林韵府》详细记录了福建茶叶的产地、品种、茶行的分工以及与洋行进行茶叶交易的华商。他是中美茶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见证人。这一侧面,不应该被忽视。

说到茶叶的药用功效,让人联想到另一种更神奇的植物——大黄。来自德国图宾根大学的闵道安(Achim Mittag)教授研究过《诗经》中的动植物名称,也曾写过大黄的文章。据他的考证,大黄有两种:一种是作为蔬菜的大黄(Rheum Rhabarbarum),它于 18 世纪末才首次传到英国,由英国再传到北美殖民地;19 世纪传到德国,19 世纪末再传到荷兰和比利时。这种绿中有红的蔬菜至今还在超市有售,是做蛋糕和果酱的食材。另一种是作为中药的大黄(Rheum Palmatum),即大黄根,也被看作是生命根。它早在公元 4 世纪即被欧洲历史学家所记载。大黄的德语单词 Rhabarber 已透露出其词源——来自野蛮人的一种根。大黄根的产地有印度、土耳其、

黎凡特(恐怖组织 IS 还想恢复这个国家呢!)和莫斯科公国,但中国青海和四川的大黄最为著名。这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已有记载。有趣的是,西方人将大黄看作野蛮人的植物,中国人则把大黄则看作野蛮人离不开的植物——如果没有大黄,爱吃肉的野蛮人就不消化,最后胀气撑破肚皮而死。直到 1793 年,乾隆皇帝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态和知识,傲慢拒绝了马嘎尔尼使团的通商请求;即便是“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也未能突破这一成见。

比痛风更险恶凶狠的是梅毒,该病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侵入旧世界,被看作是新大陆的报复行为。高晞主要利用葡萄牙文原始文献,在《“中国根”(China Root)的西文文献、人物与图谱》一文中追溯了 16 世纪初葡萄牙商人从东方带回的治疗梅毒的“圣木”——中国根——被欧洲科学家认知和传播的过程。除了神圣罗马帝国御医维萨里的专书《中国根书信》(Radiciſ Chyne),还有葡萄牙耶稣会士名医阿麻托的《医学论著》和葡萄牙医生科斯塔的《东印度医学》都论及中国根,而他们的著作都对欧洲医学革命和知识由古典向近代转型发挥了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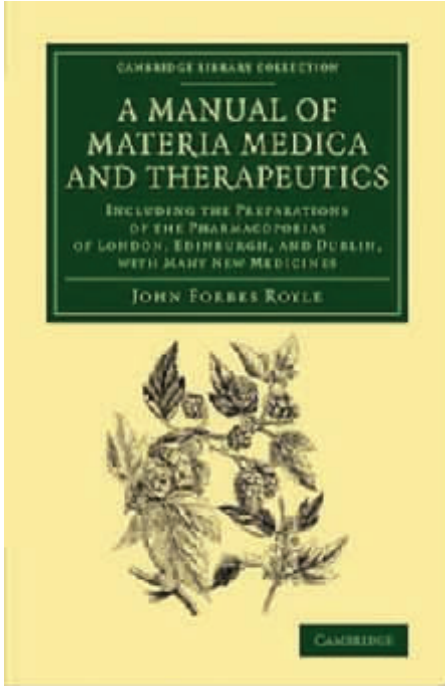
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草药也是西方人治病的主要手

段,只是限于地理位置,欧洲具有药用价值的本草种类和数量远远低于亚洲。19 世纪的西方人挟轮船和枪炮的双重优势,才得以远渡重洋,搜集异域植物。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系陈明教授在《〈西药大成〉所见中国的药物使用及其认知》中讲述了英国医士来拉(John Forbes Royle, 1798—1858)的大型本草著作于 1847 年出版后在西方的影响及其汉译本(1887 年出版)在中国的流传。来拉在东印度公司(该公司的押运员和船医是植物西传的功臣)工作过多年,又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不仅通晓西方植物,同时也熟悉东方植物,他的巨著恰好成为西方近代医学转型时期的药物学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书中大量东西方药物的相互贸易记录,是了解近代中国药物学知识和药物植物西传的重要参考资料。书中还记录了著名的“茶叶大盗”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两人曾在切尔西植物园面谈,来拉充分肯定了福钧澄清红茶和绿茶都来自绿茶的洞见,同时也肯定了他将茶树移植印度的重大经济意义。《西药大成》还记录了大量人参、甘草、茯苓和鸦片,但该书最重视的是茶叶。在陈明看来,这凸显茶叶在当时世

(下转 10 版) ➡



16 世纪研究东方医学的葡萄牙医生科斯塔 高晞供图



来拉的大型本草著作 陈明供图